

中国传统文化的 幸福思想 及当代价值

毕昌萍 著

Happiness Thought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的 幸福思想 及当代价值

毕昌萍 著

Happiness Thought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的幸思想及当代价值 / 毕昌萍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8-11805-7

I. ①中… II. ①毕… III. ①幸福—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1219 号

中国传统文化的幸思想及当代价值

毕昌萍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94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805-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得知毕昌萍博士的专著《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思想及当代价值》即将付梓,很是高兴,乐意为之作序。因为她的这部著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价值。

从学术价值来看,毕昌萍博士的该部著作是以新兴学科幸福学等为理论基础,从幸福这个独特的角度探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代不乏人,成千上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论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是,综观这些专家和著述,自觉地、有意识地全面并深入地以幸福学为指导,以幸福为主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罕见,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南怀瑾先生在讲解《论语》时,对于儒学的幸福思想与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但他这方面的论述欠系统与深入,未能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上升到幸福理论的高度,而毕昌萍博士的该部著作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本质,自觉地按照幸福学的要求对儒、佛、道三家的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探析,全面地把握和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之道与幸福之术。这就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这点是该著作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价值。

该著作的实践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和幸福中国。幸福的本质要求是真、善、美。如美德幸福观认定:

具有美德者才有幸福,而该著作揭示并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幸福文化,这就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美丽中国和幸福中国找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并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行动指南和决策依据。从幸福理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和构想的小康社会、大同世界,正是真正的幸福社会、幸福世界。第二,有助于消除幸福悖论。所谓幸福悖论是指经济增长而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反而下降。它在近二三十年严重困扰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而在近些年也开始困扰我国的民众。该著作所阐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目的论”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助于经济发展与幸福感提升相互协调,使经济增长为幸福服务。第三,有助于造就和培养“幸福人”。在现代社会,人们拼命追求快乐、幸福,但结果却离快乐、幸福越来越远,成为陷于焦虑、痛苦泥潭中的不幸福的人。而该著作所探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之道和幸福之术,使人们得以快乐、幸福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成为幸福之人。孔子的学生颜回及孔子本人就是幸福人的典范,世称“孔颜之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幸福思想十分丰富,希望毕昌萍博士戒骄戒躁、持之以恒,继续努力进取,克服不足之处,弥补疏漏之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幸福思想这个新的园地里获取更大的成果。

浙江大学 陈湘舸

2013年7月6日于湖南舜皇山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研究的背景	(1)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5)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7)
四、研究的方法与创新	(18)
第二章 幸福的基础理论	(20)
第一节 幸福概念的历史考察	(21)
第二节 幸福的特征	(30)
第三节 幸福的类型	(42)
第四节 获取幸福的条件	(51)
第三章 儒家“人世有为”的幸福思想——以《论语》为理论基础	(64)
第一节 “修己安人”的幸福取向	(65)
第二节 “内求诸己”的幸福路径	(75)
第四章 道家“出世无为”的幸福思想——以《道德经》为理论基础	(90)
第一节 “与世无争”的幸福取向	(91)
第二节 “自然无为”的幸福路径	(105)
第五章 佛家“出世无我”的幸福思想——以《心经》为理论基础	(121)
第一节 “自觉觉他”的幸福取向	(122)

第二节 “无相住心”的幸福路径	(130)
第六章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幸福实践	(142)
第一节 劳动与交往生活方式的和谐性和共享性	(143)
第二节 消费生活方式的简约性和适度性	(146)
第三节 闲暇生活方式的简约性与和谐性	(148)
第四节 精神生活方式的内在性与超然性	(150)
第七章 中国传统幸福思想的当代价值	(158)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幸福的基石	(160)
第二节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类幸福的保障	(163)
第三节 人与人的和谐:人类幸福的体现	(165)
第四节 人与自我心灵的和谐:人类幸福的核心	(168)
结 语	(174)
参考文献	(177)
索 引	(190)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的背景

幸福可谓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费尔巴哈指出：“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①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②正是由于对此种终极、自足的幸福追寻，人类已经或正在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不可否认，人类的生活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甚或可以说，正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促进了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的历史。然而，此种活动的结果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问题，并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如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等，且这些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沉醉在物欲横流中的人们无暇顾及内心的精神家园，失落、彷徨、困顿和空虚感阴霾在心灵深处，“赢得了世

①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3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界却失去了心灵”^①。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的起点和终点是追寻幸福并持续地拥有之,然而,幸福此时仿佛跟我们玩起了“捉迷藏”,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内,人们所向往的心灵幸福家园日渐丧失。

对此,早在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增长”的“幸福悖论”。^②另据荷兰伊拉斯姆斯(Erasmus)大学教授路德·魏荷文(Ruut Veenhoven)对中国三次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下降到6.60。^③数据再次证明了理查德·伊斯特林“幸福悖论”提法的正确性。这种“幸福悖论”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为何物质财富每天都在增长,而幸福却不能与之同步,甚至南辕北辙?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这无疑是强调人类在追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重视并兼顾中华文化这一人类文明活水源头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借鉴先辈的智慧以促进人类社会向着真正属人的方向发展。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断言,挽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并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④,“三

①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② Shin D. C.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a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 A., Reder M. W.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③ 陈统奎、刘劭:《关注国民幸福指数——从GDP到GNH》,《审计文摘》2006年第2期,第79页。

④ 季羨林:《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①，“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②。台湾《孔孟月刊》发行人陈立夫也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能够拯救世界人类的良方，指出：“苟我国国民人人能身体力行中国之文化道统”，“则不独国族能强，即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亦将受其赐矣”。^③

的确，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文化底蕴之深厚无与伦比，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之精髓或曰“三大支柱”的儒道佛三家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底蕴和智慧不仅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士的高度赞赏、评价及重视。首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美国总统里根曾给予孔子高度评价，孔子崇高的行为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着全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事原则。1988 年全球 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上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④伏尔泰也曾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⑤德国学者毛来夫说，孔子思想具有极其博大的内涵，是中国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孔子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另外，1985 年美国出版了《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由此，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及孔子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人文影响可见一斑。其次，以老子为开山鼻祖的道家文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本根强调，老子在其《道德经》中，以其独特的方式预见并回答了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引起了世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德国哲人尼采称赞《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说：“中国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

① 季羨林：《再谈东方文化》，《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 页。

② 季羨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③ 陈立夫：《中国文化何以能救世界人类》，《天府新论》1994 年第 4 期，第 44—49 页。

④ 转引自刘延东：《伟大的文化推进伟大的复兴》，《人民日报》2005 年 10 月 13 日。

⑤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369 页。

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这无疑强调了道家思想对于国人品格形成的至深影响及关键所在。日本学者卢川芳郎在其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中也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此说可谓一语中的,在当今市场经济竞争的大潮下,人们的身心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老子哲学犹如人类的“心灵鸡汤”,让在世俗中困顿迷茫的人们重新找回心之本真,感受心灵深处的幸福。托尔斯泰当年就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美国著名学者浦克明在研究人类最终趋向时曾断言,《道德经》肯定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老子辨》中大赞:“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鼯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充分说明了老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参观泉州老子雕像时指出:“要多宣传老子的辩证唯物思想,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整理好,宣传好。”再次强调了其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精髓作用。再次,从印度传过来的佛(释)家文化。佛家文化虽然最初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但在其后与儒、道文化的冲突中不断融合,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1978年,美国物理学家麦克·哈特出版了当时极富盛名和颇具影响力的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排行榜》,书中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排在第4位,理由是:“虽然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佛教徒,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中国佛协原主席赵朴初曾严厉指出,没有佛教,中国人的嘴只能半开半合,因为汉语里3.5万多个词汇皆来源于佛典的翻译。此说足以印证了佛家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及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世界文坛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或支柱。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对三家文化风趣地比喻道: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粮食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佛家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此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作用与影响。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很幸福,往往得意时有儒家,失意时有道家,绝望时有佛家,亦因此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之说。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集中了先哲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包含着深刻的幸福哲学,折射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尤其是人与自我心灵和谐的完美文化图景。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了自身鲜明的特性,融精神性、共享性、适度性、内在性、超然性等特征于其中,而这些正是构成幸福的必要特性和因素。对此,浙江大学陈湘舸教授曾精辟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幸福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研究和实施正确的幸福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幸福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其核心理念是如何把一种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幸福理念植入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决策与行动遵循幸福的准则或幸福的特性,即幸福文化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包括简单原则、适度原则、道德原则和和谐原则等,在这种幸福原则的指导下,人们方得以科学、有效地获取和享受幸福生活。”^①这无疑在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幸福文化、幸福理论。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究其原因在于,它蕴涵着丰富的幸福体验和幸福思想。这些体验和思想有助于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的价值失范、价值真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缓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心灵的不和谐状况,指引人们明了幸福的真谛,树立正确的幸福理念和幸福取向,掌握获得幸福的正确途径与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幸福文化、幸福哲学,更是全人类的幸福指南、幸福圣经。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是灵魂的“现实活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已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在多元化的选择与冲击下,沉浸在物欲横流

^① 陈湘舸、杜敏:《幸福文化及其价值定位》,《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第 61—66 页。

中的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迷茫和焦虑,迷失了自我,丢失了心灵深处的幸福家园,迷失中的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中国传统文化在历经几千年风雨的洗礼后,仍不失其经典古蕴,以其独有的深邃文化底蕴感染、熏陶着每一个现代人,并以其特有的幸福思想和理念,唤醒人们灵魂深处早已“沉睡”的心之本真,让人们在多元化选择的今天,内心拥有一个清亮明晰的人生准则和坐标,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找回人之为人之心性之本真,获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幸福。它以简朴的道理,循循善诱、言传身教的方式,含蓄地告知不知所措的世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获取幸福等,令古今之贤仁众生迷惑不解之难题,传递出一种超然淡定的崇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唯有深刻剖析、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幸思想才能真正懂得“何谓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学会在现代生活中去感受并获取心灵所需要的幸福。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研究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①今天,我们从幸福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所贡献,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增强国民的幸福感,以及获得人自身的和谐与自由,无疑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幸福不仅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而且更应该属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首先,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幸福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全体人民的幸福安康。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人民心声的可持续性的幸福理念。其次,就人类个体而言,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幸福”,“要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幸福的理解达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成某些基本的共识和价值取向,并由此形成正确的幸福理念,如此才能更为合理地追求幸福、享受幸福。因此,探索我国传统文化的幸福观思想并从中萃取适合时代需求的正确的幸福理念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幸福学的研究现状

幸福(happiness),作为人类的终极目的和永恒追求,可谓历久弥新。国内关于幸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为小规模实证调查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一些特殊群体,如女性、老年人、大中小学师生、教师、农民等。研究的内容大都是关于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特征及相关的幸福指数差异,或者研究在同一时期内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情况,以及造成此差异的因素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幸福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出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我心灵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如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等,这些危机最终演化成人类的幸福危机,导致了人类的幸福困惑、幸福悖论等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人类对幸福的渴求却又日益强烈。有鉴于此,学术界试图从不同角度创造性地提出或论及幸福学这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学科。

专著方面:国内研究幸福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陈瑛的《人生幸福论》,孙英的《幸福论》,江畅的《幸福之路:伦理学启示录》,孙瑞坤、孙岩的《幸福》,高兆明的《幸福论》,陈根法、吴仁杰的《幸福论》,高恒天的《道德与人的幸福》,奚恺元的《撬动幸福》,冯俊科的《西方幸福论》等。这些著作或从伦理学角度,或从社会学角度,或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要素、幸福观的类型等问题。其中陈瑛教授的《人生幸福论》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详尽论述人生幸福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他们是国内研究幸福问题的领军人物。

论文方面:美国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奚恺元等在《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一文中指出: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最主要的方法。有鉴于此,传统经济学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增加社会的财富

上面。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能有效地增加人们的幸福感。针对此论点,作者认为:传统经济学转变了方向,出现了新方向——幸福学。^①可以说,奚恺元是将幸福学引入我国的第一人。

梁德淳在《幸福学:一门待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新学科》一文中指出:幸福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幸福的本质规律,并总结为一定的理论方法,用以指导人类获得幸福的应用性科学。幸福学的创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它将有助于人类在理性认识幸福实质的基础上获取幸福。认为就学科地位而言,幸福学具有终极意义,因为站在幸福学的立场,可以对各类学科进行甄别、审定,判明其存在的价值。^②充分肯定了幸福学创建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

陈湘舸、姚月红在《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一文中分析:当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解决好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取幸福这个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创建幸福学,并且确认它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母学”,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南。在幸福学的统领与指导下,各门社会科学围绕人类的终极目的联合“攻关”,可望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幸福问题,从而完成幸福世纪的幸福革命,实现建设幸福国家和幸福世界的目标。文章指出,以幸福为研究对象,以增进和保持人类幸福感为宗旨和目的的幸福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终极意义。^③这是继梁德淳之后,再次重申了创建幸福学的意义,肯定了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这一特殊、重要地位。

陈湘舸、王艺在《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一文中分析指出:现代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一种“不幸福的经济学”了,要真正克服乃至根除“不幸福经济”现象,必须在经济学领域内掀起一场彻底的“幸福革命”,从根本上恢复经济学的幸福本质。指出,必须立足于“幸福”这一终极价值和目标,在深刻扎根于“母学”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

① 奚恺元、张国华、张岩:《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上海管理科学》2003年第3期,第4—5、18页。

② 梁德淳:《幸福学:一门待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新学科》,《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32—37页。

③ 陈湘舸、姚月红:《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5页。

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①

朱院利在《试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幸福学意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幸福与否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水平高低,更关注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除了受到收入影响,还会受到诸如社会环境、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睦的家庭关系、健康等等因素的影响。结论说,人类与环境间良性的物质交换关系是幸福获得的前提条件,环境是人类获得幸福的物质基础。生态安全成为人类在发展中关注的焦点,成为幸福与否的关键所在。^②

卢苓霞在《“幸福学”为决策指出新方向》一文中分析说:传统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理性人假设;二是经济人假设。但在实际生活中,传统经济学的这两种假设往往不能奏效。文章指出,“幸福学”作为一门全新的研究人们幸福规律的理论、科学,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决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现代决策问题,为我们的决策指出了新的方向和理念。认为,新的人性假设应该是“幸福人”,人们追求财富只是为了获得幸福,“追求财富”是手段,而“幸福”才是根本目的,而且“增加财富”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之一,却并不是唯一手段,也不是最重要的手段。^③

另有学者从公共政策、企业管理的层面研究幸福学的意义与作用。如苗振国的《幸福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价值重塑》一文指出: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效率和公平为基点的双重价值取向,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而幸福学的研究为公共政策的价值重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据此认为,我国的公共政策应将幸福确立为终极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由幸福、效率、公平构成的三维价值取向。因此,应该创建一门研究人类幸福的本质规律并总结为一定的理论方法、用以指导人类获得幸福的应用性科学,即幸福学。^④ 可以看

① 陈湘舸、王艺:《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11期,第32—36页。

② 朱院利:《试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幸福学意义》,《福建论坛》2009年第4期,第71—73页。

③ 卢苓霞:《“幸福学”为决策指出新方向》,《经营与管理》2006年第2期,第43—44页。

④ 苗振国:《幸福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价值重塑》,《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45—48页。

出,这主要是从政策的层面高度强调幸福学的重大意义。

2. 传统文化幸福思想的研究现状

学界研究此问题的专著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有:林在勇的《道破幸福的天机:〈论语〉里的人生智慧》、李煌明的《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王建光的《如是我乐:佛教幸福观》。

论文主要有:

沈利华在《中国传统幸福观论析》一文中指出:长生久视、功名富贵、知性自足这三方面是过去中国人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幸福观念。其中知性自足是中国人传统幸福观的核心,也是人生幸福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学派儒、道、佛在知性自足这一点上都有一致而明确的表述。诸家皆认为“道出性生”,故求道皆以内求为共同方法,不但追求主观精神的满足,且无不以“自省”“自悟”“反求诸己”为唯一途径。^①强调了传统文化幸福思想的共同之处及其包含的幸福之道术。

刘绍斌在《至善、幸福、德行——亚里士多德与儒家幸福观比较》一文中,从至善德行与仁爱好德的角度分别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儒家的幸福观。指出,儒家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由上天或命运决定的,而认为“攸好德”是主观可以追求的。就此认为,儒家的幸福标准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在儒家的思想中,幸福只不过是道德的附属物,唯有道德才是幸福。指出,儒家的幸福观实际上有两条:一是道德、精神的快乐;二是普天之下的共同快乐。^②

张刚在《儒家幸福论——读李煌明著〈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有感》一文中指出:幸福一定是快乐的,不快乐一定不会幸福。因此,只有先确定快乐的性质,幸福的定义才可能被界定。而对于快乐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分析产生快乐的种种需要;一是通过揭示快乐内涵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演变来自发乃至自觉地涵养出快乐的定义。前种方法经常被西方学者或接受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中国人使用;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德性”思维模式。认为李煌明博

① 沈利华:《中国传统幸福观论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30—35页。

② 刘绍斌:《至善、幸福、德行——亚里士多德与儒家幸福观比较》,《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第144—145页。